

当代台湾地区公众政治信任的发展与演变：水平、结构与影响因素

李艳霞*

摘要：政治信任是影响政权合法性、政治稳定以及治理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对象分布与层次结构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以考察2000年以来台湾民众政治信任在水平、结构以及影响因素方面的发展变化为核心，以东亚民主化调查2001-2014年四波数据为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公众对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差异较大，对于党派色彩浓厚的机构，公众的信任程度较低；在影响因素层面，公众对政府质量、政治体系保护公民权利、推进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民主程度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具有较大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以及社会信任会促进公众政治信任心理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公众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不断提升，而公众对台湾民主体制评价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逐渐减弱。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府质量；治理绩效；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 (2018) 02-0055-008

DOI:10.13818/j.cnki.twyj.2018.02.007

一、政治信任的相关理论回顾

政治信任是国家一系列治理成效在公众心理层面的投射，是公众对于政治体系的基本评价与情感取向。^[1]在体制层面，公众政治信任影响政权合法性以及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赖以生存的关键社会心理基础。在公众个体层面，政治信任直接影响其政治行为模式，是解释政治支持、体制外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2]Gamson认为：“由于信任，公众授权并让政府做出决策达到社会目标，并且不需要透过高压统治的方式就能让公众顺从。”^[3]Weatherford则指出：“信任能让公众允许政府做出追求长期利益的决策，即便这样的政策在短期内是不受欢迎的。相反，一旦公众收回或减少对政府的信任必将减少其对政府政策的遵循。”^[4]可见，政治信任是维系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重要桥梁^[5]，对于政治体系的顺利运转意义重大。正因如此，政治信任一直作为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政治系统理论、公民文化理论以及社会资本等理论为依托，

* 作者简介：李艳霞，女，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17ZZB001）阶段性成果，并受厦门大学校长基金“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项目批准号：20720171004）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推进两岸民间交流与社会融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GAT001）资助。

政治信任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几十年来,欧美学界关于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信任的测量与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分析两个方面。

政治信任的测量是学界进行政治信任研究的起点与重要动力。^[6]1958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将测量公众的政治信任作为其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从此便开启了世界各个民主化调查与价值观调查对于公众政治信任的关注。然而,针对政治信任这一复杂的微观政治心理,不同学术机构对政治信任的测量维度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在进行政治信任测量时比较注重公众对于执政当局的施政表现的主观评价,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实际运作能否满足公众的期待是衡量政治信任的核心,对政府及官员的能力、操守、执政动机的评价即成为衡量政治信任的最重要指标。美国国家研究(ANES)的测量体系侧重于考察公众对政府体系信任的考察,一度受到世界许多学者的广泛采用。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迈入转型国家的行列,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政治信任测量体系只针对传统西方民主国家的弊端逐渐暴露。由于转型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中立法、行政、司法等不同机构不能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完全独立运行,相应的,公众对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如立法、司法)的信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整体政治信任水平。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在测量政治信任水平时(尤其在转型国家和新兴民主化国家和地区),只用一个机构(政府)为标的考察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是不合适的。Norris和Mishler and Rose等人就提出对于政治信任的测量应当涵盖公众对中央政府、立法机构、法院、政党、警察、军队等政治相关机构的信任测量。^[7]这一测量方案被“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全球动态调查”(Global Barometer, GB)等许多调查研究机构采用。本文对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测量也是采用此种测量方法。

对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分析是政治信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理论界形成了两种分析的角度,即制度绩效决定论与文化生成论。制度绩效决定论者认为,公众是否信任政府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体系的产出如何,或者政治程序上是否有合乎主流的正义标准,如政治体系推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如何?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怎样?政治领域是否清廉?政治程序是否公开与透明等^[8]。如果说制度绩效论者侧重从人之理性这一普遍性的角度考察政治信任的来源,那么文化生成论者则着力从人的文化、社会、历史属性,即人所存在的具体的时空背景的角度对其政治信任予以考察,文化生成论者认为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与该社会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套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以及人们之间长期的交往方式关系密切。政治信任孕育于社会系统之中,是社会信任的拓展。有学者用了大规模的跨国时间序列分析得出结论,有些社会具有高度信任的文化,而有些社会是以低度信任文化为特征的。^[9]罗伯特·帕特南则通过对意大利南北部的比较证明,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的社会交往模式也会导致不同信任文化的产生,进而影响到政府的治理绩效。^[10]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公众高度政治信任的关注则证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乃是公众的政治信任的重要文化支撑。^[11]以上是学界分析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两个维度,也是本文分析台湾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主要理论依据。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台湾经历了立法机构全面改选、行政机构直接民选,直至2000年,台湾民进党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台湾经历了民主化转型的核心历程。经历了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众的政治信任心理也必然有了显著的不同。此外,近年来,台湾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甚至某些年份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根据台湾主计处发布的台湾人均GDP结果,2014年台湾人均GDP为22668美元,2015年人均GDP为22384美元,呈现负增长态势),政治、经济环境必然带来公众政治心理的变化,细致考察当代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水平、结构以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深入了解当代台湾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把握当代台湾公众与政治体系的互动模式。为此,本文以东亚民主化调查2001-2014年间的四波数据(2001年、2006年、2011年、2014年)中台湾的数据

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以期更加细致深入地了解当代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心理在水平、结构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演变与发展。四次问卷调查以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公民为对象，以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的方式确定样本，第一波(2001年)台湾地区数据总样本为1415人、第二波(2006年)台湾地区总样本为1597，第三波台湾地区的总样本为1592人，第四波(2014年)台湾地区总样本为1657人。^[12]

二、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总体水平及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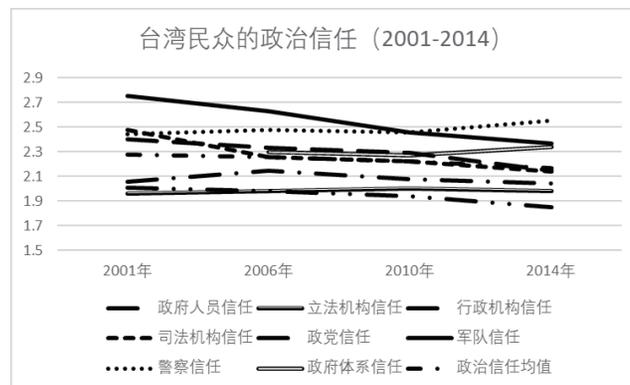
依据前文对于政治信任测量方式的分析，本文对于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测量采用多种政治机构信任测量的方法，即针对公众对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政党、军队、警察等不同机构的信任程度考察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依据问卷采用的四点式利克特量表，即非常信任、比较信任、比较不信任、非常不信任四个等级依次赋值4-1分，以公众对各个政治机构信任得分的平均分衡量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具体统计结果见表1。

表 1: 台湾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变迁

	2001年	2006年	2010年	2014年
政府人员信任	2.06 (.570)	2.15 (.576)	2.08 (.593)	2.04(.543)
立法机构信任	1.96 (.725)	1.98 (.707)	2.00 (.679)	1.98 (.662)
行政机构信任	2.40 (.691)	2.33 (.694)	2.29 (.659)	2.15 (.657)
司法机构信任	2.48 (.696)	2.26 (.718)	2.22 (.723)	2.14 (.698)
政党信任	2.01 (.630)	1.98 (.657)	1.94 (.657)	1.85 (.638)
军队信任	2.75 (.703)	2.63 (.726)	2.46 (.755)	2.37 (.748)
警察信任	2.44 (.723)	2.48 (.724)	2.46 (.731)	2.55 (.714)
政府体系信任		2.30(.711)	2.27(.751)	2.34(.629)
政治信任均值	2.28	2.26	2.22	2.17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化调查四波数据；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图 1: 台湾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变迁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化调查四波数据

表1和图1的统计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14年这十几年的发展趋势上看，台湾公众政治信任

水平总体上呈现不断降低的态势。具体考察公众对各个机构的信任可以发现,十余年间,公众对立法机构的信任水平比较稳定,对警察的信任水平在2014年有所提升,对于其他各个机构,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均不断下降。从各个政治机构公信力比较来看,台湾公众对各个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差别较大,公众对不同机构的信任由高到低大致分别为:军队、警察、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立法机构和政党。其中,公众对立法机构和政党的信任程度在历次调查中都是最低。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台湾公众对各个不同的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与该机构的“政党色彩”是否浓厚有一定关系,即具有一定政党色彩的政治主体,如立法机构、政党等会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党派把持的政治机构,公众对其的信任程度较低,而倾向于“中立化”的政治主体,如军队等,公众对其的信任程度则比较高。2000年之后,台湾经历了领导人选举中的政党轮替,由于政党竞争体制的推行,公众会因为对不同党派的认同或疏离而产生对此党派所把持的政治机构的认同或疏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政党支持的差异是形成台湾公众对不同政治机构信任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13]此外,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将政治支持分类为弥散性支持(diffuse political support)与特殊性支持(special political support),此种分类也成为后来众多学者对政治信任分类的重要标准之一。其中,弥散性政治信任主要针对政治社群和政治体系的信任,相对而言,特殊性政治信任则主要指向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以及政治体系工作人员的施政表现。从上文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台湾公众对其政府治理体系的信任程度要高于其对各个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均值;台湾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总体上高于其对特定政治人员的信任。在此意义上,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呈现出弥散性政治信任高,特定性政治信任低的特征。

三、台湾公众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前文的相关论述,本文以制度绩效和文化传统两个层面为切入点,并结合台湾公众的人口学特征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2006年至2014年影响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因素予以分析。(因为第一波数据变量不全,本文仅将第二波至第四波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具体的变量操作化以及分析结果如下:

(一) 因变量的操作化

作为研究核心,政治信任是模型构建中的因变量。根据以往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操作,我们将公众对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军队、警察、政党的政治信任取均值作为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多元回归模型的因变量。

(二) 自变量的操作化

在自变量层面,本项研究以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为基础,选取公众对政府质量、公共服务、公民权利实现程度、经济现状的评价作为制度绩效层面的自变量,选取威权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信任作为文化层面的自变量,加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参与意愿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具体指标与操作化过程见下表:

表 2: 影响政治信任的自变量指标

维度	指标	指标操作化说明
人口特征	性别	男性: 0; 女性: 1
	年龄	根据受访者实际年龄为准
	受教育程度	大学以及以上教育程度: 0; 大学以下教育为 1

制度绩效	政府质量评价	对受访者关于“政府守法程度”、“政府回应性”、“信息公开度”、“行政机构腐败程度”、“政府反腐败决心和力度”的认知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政府质量因子” ^{1[4]} 。
	公共服务评价	对受访者关于“获取身份证件”、“小孩接受基础教育”、“获得医疗救治”、“在需要时获得警方帮助”四项公共服务便捷程度的评价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共服务评价因子”。 ^{2[5]}
	公民权利评价	对受访者关于本地区人们的“基本生存保障”、“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平等对待”、“公民具有言论自由”、“公民具有结社自由”的评价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民权利评价”因子。 ^{3[6]}
	经济现状评价	“你对现在的经济运行情况的总体评价如何?” 1: 不好 2: 一般 3: 比较好 4: 很好
	民主评价	总体来讲,你对目前的民主运行方式是否满意? 1: 非常不满意……10: 非常满意
政治文化	威权主义倾向	“即使父母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子女也要服从。” 1: 完全不同意; 2: 比较不同意; 3: 比较同意; 4: 完全同意
	集体主义倾向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可以被牺牲。” 1: 完全不同意; 2: 比较不同意; 3: 比较同意; 4: 完全同意
	社会信任水平	对“亲人的信任”、“邻居的信任”、“交往中的其他人的信任”三个变量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社会信任”因子 ^{4[7]} 。

(三) 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分析

以表2中所示的自变量构建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多元回归模型(见表3)。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各个统计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各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因变量,即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

表3: 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1 (2006年)	模型2 (2010年)	模型3 (2014年)
性别	0.049*	0.090**	0.055**
年龄	0.089***	.023	0.053
受教育程度	.073**	0.050	0.112
政府质量评价	0.247***	0.360***	0.182***
公共服务评价	0.012	0.052	0.058**
公民权利评价	0.143***	0.008	
经济现状评价	0.117***	0.138***	0.146***
民主评价	0.154***	0.092**	0.069**
威权主义倾向	0.067**	0.076**	0.031
集体主义倾向	0.006	0.071*	0.033
社会信任水平	0.123***	0.212**	0.055**
常量	1.875	1.749	1.941
Adjust R2	0.248	0.306	0.177
N	1163	1021	1225

数据来源: 东亚民主化调查;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表3中显示的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以及公众的文化观念乃是影响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 此乃三波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所呈现出来的共性特征。具体表现为, 在制度绩效层面, 公众对

政府质量的评价、对公民权利保障的评价、对经济现状的评价,对民主运行的满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在文化观念层面,公众的社会信任水平、公众的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公众政治信任的文化心理基础。在控制变量层面,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政治信任水平更高,在模型1,即2006年的统计模型中,年龄越大的公众,没有受到过大学教育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更高。另外,如果将三个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近十年发展中,公众对政府质量的评价一直是影响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最为重要的变量。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经济现状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在2006年到2014年之间逐渐增强,而公众对民主制度运行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则逐渐减弱,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在最近一波的数据调查中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公众对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评价只在2001年的模型中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影响力。在政治文化层面,公众的社会信任水平在三个模型中对公众的政治信任都具有影响力,而公众的威权主义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在2010年和2014年的模型中则对公众的政治信任不具有影响力。

四、结论与讨论

以前文的数据统计结果为依据,本项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与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 2000年以来,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总体上,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呈现出弥散性政治信任高,特定性政治信任低的特征;公众对各个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差异较大。

前文的统计结果显示出,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总体水平不高,而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在1992年至1998年逐年下滑,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政党轮替之后略有回升。^[18]如果结合本文的统计结果可以判断,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即不断下降,虽然在2000年左右略有回升,但此后又一路走低,并未改变下降的势头。总体看来,台湾公众对其政府体制、政治机构、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水平逐渐下降,呈现出弥散性信任高,特定性信任低的特征。此外,公众对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差别较大。公众最信任的政治机构(军队)得分比公众最不信任的政治机构(立法机构和政党)得分高出将近一个层级。通过比较公众对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可以发现,政治机构的“政党色彩”是否浓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这一机构的信任。“政党色彩”较浓厚的机构,公众对其的信任水平较低,而对于“中立性”色彩较浓厚的机构,如军队和司法机构等,公众对其的信任水平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历了民主化转型之后,公众的政治心理所发生的微妙变化。

(二) 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呈现出理性策略与文化认同并重的复合型信任特征,且政府的治理过程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更较大。

正如前文所述,在分析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时,学界历来存在着“制度生成论”和“文化生成论”两种观点。而这两种观点则分别立基于对政治信任主体,即公众的“理性选择”特质还是“群体认同”特质的关注。如果我们简单的把受理性选择影响的政治信任称之为“策略性信任”,受群体文化认同影响的信任称之为“认同型信任”^[19],那么,从影响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基于策略与认同的复合型信任是台湾公众政治信任主要特征。这说明,虽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治体系应实现良好治理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对政府治理绩效的切身感受和理性判断已然成为影响台湾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此外,在代表政府治理绩效的四个变量中,台湾公众对代表政治治理过程的政府质量因素的评价其政治信任具有较为持久的影响力。这说明,公众在确定是否对政府付出信任时更加注重政府治理过程是否公开、公正、守法以及政府的回应度如何等政府自身的特质。

(三) 公众对政府质量评价和儒家文化传统为台湾政治体系提供了政治信任资源。

威权主义倾向与集体主义倾向对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作用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许多研究东亚地区政治文化的学者的判断。即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态度不仅依据政治体系的客观表现,也依赖于人们内心中所固有的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特征之一。本项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过,正如有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这种威权主义倾向与集体主义倾向会随着现代化、民主化的推进而逐渐减弱,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在2006年到2014年这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儒家文化中威权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在一定意义行呈现出不断减弱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化与儒家传统文化在公众政治心理影响中的博弈过程。这是否说明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已经出现了策略性信任主导,认同性信任式微的趋势,这还需要通过更长时段的考察加以确认。

(四)近十年间,台湾公众对经济现状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民主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不断减弱。

正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台湾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失业率,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失业率逐渐攀升,切肤之痛促使公众在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时出现了价值重心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短缺心理”,即当某种物品、机会等变得越来越稀少时,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这一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反映出治理绩效对于政权合法性塑造的重要意义。相对而言,台湾公众对台湾以政党轮替为特征的民主体制运行的满意度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在2006到2014年间不断下降,这也在一定意义符合许多学者对于台湾近年来民意发展方面的判断,即经历了十几年间政党轮替制度的运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光环在台湾公众心中不断淡化。^[20]对而言,政府质量与政府治理水平如何,尤其是对执政体系是否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这一因素已经成为公众是否信任政治体系的重要指标。

注释:

[1] Arheur H Miller,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1964-197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8, No.3. (1974), pp.951-972.

[2]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182页。

[3] William Gamson,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Chicago:The Dorsey Press, 1968), p.43.

[4] Stephen.M.Weatherford, *Economic Stagflation and Public Support for the Policial Syste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4), pp.187-205.

[5] William•Bianco, *Trust: Representative and constituents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67.

[6] 政治信任这一话题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其自身具有较强的理论张力与包容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近年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公民政治信任不断下降的事实。哈佛大学Ney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对政府信任持续下降的趋势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共同现象,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荷兰等国家都面临着相同的政治信任不断下降的难题。(Ney and Joseph S.,” Intruduction: The Decline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in Ney,J.S,Zelikow,P. D. and King, D.C.(eds.), *Why People Don’ 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7] 参见 Pippa Norris. “Institution Explanations for Political Support”, in *Critical Citizen: Global Support for Demorcractic Government* (Oxford:Oxford Univercity Press), pp.217-235; William.Mishler and Rose Richard. “Trust,Distrust and Skepticism:Popular Evaluation of Civil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Vol.59, No.2,pp.418-451.

[8] 参见 Kenneth Newton and Norris Pippa, “Confidence in Public Institutions: Faith, Culture, or Performance”, In Susan Pharr and Robert Putnam(eds.) , *Disaffected Democracies:What’ 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2-73; Joseph Nye, “ Introduction: The Decline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In Phillip Zelikow, Joseph S, Nye and David C.King(eds.) ,*Why People Don’ 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city Press, 1997),

pp1-19; Frederick Turner and Marts John. "Institutional Confidenc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32, No.3(1997)pp.65-84.

[9]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信任、幸福与民主》载马克·沃伦主编《民主与信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10] [美]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 Wang Zhengxu, "Before the E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5, No.1 (2005), pp.155-177; 马德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5期; Shi Tianjian,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3, No.4 (2001) pp.401-419.

[12] 具体抽样方案与调查的执行情况参见东亚民主化调查网站: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survey/survey-methods>

[13] 吴亲恩:《台湾公众政治信任之差异》,台湾《台湾政治学刊》,2007年第6期。

[14] 政府质量因子: KMO 值: 0.772; 因子方差贡献率: 45.156%。

[15] 公共服务因子: KMO 值: 0.881; 因子方差贡献率: 42.123%。

[16] 公民权利因子: KMO 值: 0.662; 因子方差贡献率: 55.563%。

[17] 社会信任因子: KMO 值: 0.649; 因子方差贡献率: 62.739%。

[18] 陈陆辉:《政治信任、施政表现与民众对台湾民主的展望》,台湾《台湾政治学刊》第7卷,第2期,2003年12月。

[19] Erin Staub, *Positive Social Behavior and Moral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20]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责任编辑:石勇)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n the Public Political Trust in Contemporary Taiwan: Level,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Li Yanxia

Abstract: Political trus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s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the cost of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ome new feature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structure of Taiwan's public political trus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aiwan's political trust in the level,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since 2000 based on the 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 The Statist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 declining trend in Taiwan's public political trust in recent years and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on the level of public political trust among different institution. The more one institution has been affected by parties, the less public trust it will gain. On the aspec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public evaluation to the government quality, the protection to the civic right, the promo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mocracy affect public political trust. Meanwhile, the authoritarian valu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and social trust will sustain the public political trust in Taiwan. It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at the impact of public evaluation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political trust has been increasing, while the impact of public's evaluation on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has gradually weakened in recent ten years.

Key Words: Political Trust; Government Qual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Confucian Culture